

# 杏雨書屋《敦煌秘笈》所見《維摩詰經》 及其相關文獻

鄭阿財

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兼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

## 中文摘要

《維摩詰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以其內容深富思想性、藝術性及文學性，而在漢傳佛教中廣為流傳。此經譯本眾多，自後秦鳩摩羅什譯出後，更透過書寫、講解與注疏，在晉唐時期廣為流傳，推動著維摩信仰的發展。

《維摩詰經》為敦煌寫本五部大經之一，大量有關《維摩詰經》的文獻，包括不同譯本的經文、各家的注、疏、義記、講經文，以及歌讚，除具文獻價值外，也是考察維摩信仰文化的實證。

2013 年日本出版了全部 9 冊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其中有關《維摩詰經》文獻的比率甚高，值得重視。

本文檢閱《敦煌秘笈》刊布的 758 號中所收《維摩詰經》相關文獻 35 件，根據圖錄內容，加以分類，簡要敘錄，呈現其寫卷情況；論述其文獻價值與相關問題，以供參考。

**關鍵詞：**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杏雨書屋、敦煌秘笈、注疏、義記

##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and Related Texts in the Dunhuang Collection from the Kyo-U Library

CHENG, A-ts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s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Dunhuang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

### Abstract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is a crucial Mahāyāna Buddhist scripture. It is well known for its profound thoughts and its artistic and literary significance. There are numerous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is text. Since Kumārajīva translated it in 406, numerous writings, commentaries, anno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n this text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medieval period, which promoted the Vimalakīrti cult.

The Vimalakīrti scripture is also one of five key text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A great number of scriptural texts, annotations, commentaries, records of meanings, and lecture texts, as well as eulogies on this text have been found in the Dunhuang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They have enriched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Vimalakīrti literature and the Vimalakīrti cult.

In 2013, the Kyo-U Library in Japan eventually published all nine volumes of its Dunhuang Collection. Some texts on the Vimalakīrti scripture have been also known to reader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35 texts in the 758 group of the Kyo-U collection,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the Kyo-U Library, the Dunhuang Collection, commentaries, records of meanings

## 一、前言

《維摩詰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以其內容深富思想性、藝術性及文學性，而在漢傳佛教中廣為流傳。此經譯本眾多，自後秦鳩摩羅什譯出後，更透過書寫、講解與注疏，在晉唐時期廣為流傳，推動著維摩信仰的發展。因此《維摩詰經》的流布，不但促進維摩信仰在中土文士居士信仰的開展，滲入民間；且深度影響到文學、藝術、文化的各個層面，其影響力幾乎可與觀音信仰相媲美。六朝詩文中頗多有關《維摩詰經》的贊咏，甚至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還以「維摩」為字，唐朝詩人王維，以「維」為名，以「摩詰」為字，足見六朝隋唐以來維摩信仰的普遍。《維摩詰經》的書寫與圖像的繪製，無疑是推動維摩信仰主要媒介，對維摩信仰的發展，起到重大的作用。唯此類寫卷及繪畫，後世大多不存，以致考察不易。

本人整理研究「敦煌寫卷維摩詰經」之相關文獻，擬以敦煌寫本為核心，結合今存西域的吐魯番、高昌、龜茲、于闐古寫經，西北邊陲的西夏漢文寫經，從漢傳佛教與漢字文化圈的視野，針對其中《維摩詰經》的相關文獻展開全面考察研究，整理其所保存古佚的《維摩詰經》注疏，尋求其共同特性，析論其呈現之民族與區域的獨特性，希冀補充傳世漢文藏經之不足，考察漢文佛教文獻傳播的實況；探究漢文佛典在漢字文化圈傳播的取舍與特色；開闊古寫經的研究視野，拓展敦煌文獻研究的新境界。

適逢應邀參加「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之際，因特就日本杏雨書屋新近出版《敦煌秘笈》所公布的 700 多件寫卷，梳理其中《維摩詰經》的相關文獻，簡要論述其學術價值，以供參考，並作為本計畫之前置工作。

## 二、敦煌本《維摩詰經》研究之回顧

《維摩詰經》成立於西元 1 至 2 世紀的古代印度，是最古老的大乘佛典之一。根據中國歷代經錄著錄《維摩經》的漢譯從東漢靈帝中平 5 年（188 年）至唐高宗永徽 7 年（650 年）近 500 年間，先後計有七譯<sup>1</sup>；唐·窺基《說無垢稱經疏》卷一本云：「此經前後，雖復七翻：嚴佛調漢翻於白馬，支恭明吳譯於武康，法護、叔蘭、密多三士，東西兩晉，各傳本教。羅什翻于秦朝，和上暢于唐。」七譯分別為：

- （1）後漢臨淮沙門嚴佛調譯《古維摩經》二卷。
- （2）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維摩詰經》二卷。
- （3）西晉西域優婆塞竺叔蘭譯《異毗摩羅詰經》三卷。
- （4）西晉三藏竺法護譯《維摩詰所說法門經》一卷。
- （5）東晉西域三藏祇多蜜譯《維摩詰經》四卷。
- （6）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三卷。
- （7）唐三藏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

現存的有支謙譯《維摩詰經》2 卷（《大正新脩大正藏經》14 卷，No. 474）、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3 卷（《大正新脩大正藏經》14 卷，No. 475）、玄奘譯《說無垢稱經》6 卷（《大正新脩大正藏經》14 卷，No. 476）等 3 部，嚴佛調、竺叔蘭、竺法護、祇多蜜等 4 譯本已佚；學界對嚴佛調及祇多蜜是否有譯本亦有質疑，因而也有六譯、五

---

※ 收稿日期 2014.9.30，通過審稿日期 2015.8.19。

<sup>1</sup> 《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譯的看法<sup>2</sup>。無論如何，傳世三譯本則無異議的；其中以鳩摩羅什所譯最為流通。

有關本經的注疏，始於後秦鳩摩羅什與弟子僧肇等的《注維摩詰經》，南北朝至隋唐時注疏更是一時蠡出，足見該經在中古時期的流傳與維摩信仰的盛行。傳世注疏主要有慧遠《維摩義記》、智顗《維摩經玄疏》、吉藏《維摩經義疏》、《維摩經玄論》等，其他大多散失亡佚。

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大量北宋初期以前的古寫經，其抄寫時代從4世紀到11世紀，時間跨度700多年，其中保存的佛教寫本文獻，正好提供中國中古時期佛教經典流傳與發展的珍貴資料。王重民〈記敦煌寫本的佛經〉一文中曾云：

這二萬漢文寫本佛經中，數量最多的是隋唐時代最通行的五部大經，即《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和《維摩詰所說經》……《維摩

<sup>2</sup> 有關嚴佛調譯《古維摩詰經》的說法，蓋出於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二：「《高僧傳》云：『《古維摩詰》等六部經合十卷，並臨淮嚴佛調於洛陽出之。』」（CBETA, T49, no. 2034, p. 34。）然梁·慧皎《高僧傳》、梁·僧祐《出三藏記集》並無此相關記載，僧肇〈維摩詰經序〉但稱「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隋·法經《眾經目錄》均未提及嚴佛調譯本。故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說：「至隋費長房始著錄其所譯《古維摩經》第六部（合《十慧》為七部），其中《內習六波羅蜜經》，《安錄》入於失譯中，不知長房何因知其為調所譯，餘五部多大乘經，不似安侯、都尉風味，且早佚失，疑長房所言只係懸揣（其中一部乃據《古錄》及《朱士行錄》，然長房自言未親見二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至於東晉祇多蜜譯《維摩詰經》四卷，僧祐《出三藏記集》、法經《眾經目錄》等也未提及，因此日本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以為應有部分「乃抽自異經、失譯經中，而擬為祇多蜜所譯，故根本不足相信。」（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頁77。）

詰所說經》六八二卷（北京四四九卷，倫敦二三三卷）……。單這六部大經，而且只統計了北京（只限《敦煌劫餘錄》所著錄的）、倫敦所藏的就有八六三八卷。再加上伯希和劫往巴黎的和散在國內與日本的，這六部大經的總數估計為一萬二千卷是不會有多大差錯的。這就佔去敦煌寫經總數的百分之六十。<sup>3</sup>

今所公布知見的敦煌寫本，依編號總數已達 6 萬號。其中有關《維摩詰所說經》的相關文獻，包括不同譯本的經文、各家的注、疏、義記、講經文，以及歌讚，數量約 1400 多號。不但數量可觀，而且頗有傳世文獻所不載者，除了具文獻價值外，也是考察維摩信仰文化的實證。

敦煌藏經洞發現後，新興的「敦煌學」快速發展，其中有關《維摩詰經》的議題，主要分屬佛教文學、藝術與文獻三個面向。文學方面，特別是以「文殊問疾」為主的敦煌維摩詰經講經變文，膾炙人口，最受矚目，從 1930 年陳寅恪發表〈敦煌維摩詰本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sup>4</sup>開始，維摩詰經講經文的研究始終是變文研究的熱點，據余所收錄便多達近 40 篇<sup>5</sup>；同樣的情況，維摩變相、維摩經變也是敦煌石窟壁畫主要表現，長久以來也是敦煌佛教藝術研究的重要項目之一，論著篇章也頗為可觀。至於敦煌寫本《維摩詰經》相關文獻的研究，則是隨著古寫經的陸續公布而深受關注，然而不幸的是由於寫卷發現時的諸多時空因素，以致未能及時有系統的完整保存，導致流散世界各地，散藏公私，造成研究的不便與制約。

<sup>3</sup> 王重民遺稿，〈記敦煌寫本的佛經〉，《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2，1983 年，頁 1-25（後收入《敦煌遺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288-308）。

<sup>4</sup> 陳寅恪，〈敦煌維摩詰本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2-1，1930 年，頁 6-10。

<sup>5</sup> 拙編，《敦煌變文研究論著目錄（1908-2014 年）》（稿），待刊。

回顧敦煌寫本《維摩詰經》相關文獻之研究發展，正如敦煌學發展一樣，都是與新資料的刊布相起伏。1911年起，敦煌文獻開始陸續公布，學界開始關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佛教經卷、注疏等文獻，連續發表多篇論文。如：1911年，妻木直良發表〈敦煌石室五種佛典之解說〉<sup>6</sup>，松本文三郎（1869-1944）發表〈敦煌本大雲經と賢愚經〉<sup>7</sup>……等開啟了敦煌佛經研究；在中國李翊灼（1881-1952）據京師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撰成〈敦煌石窟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sup>8</sup>，其中便著錄了《維摩經疏》20件、《維摩經解》4件、《維摩經科要》1件、《維摩經義科》1件、《維摩經義記》1件、《維摩經肇注》14件、《維摩經集解關中疏》9件，既開啟了佛教佚典的研究，更關注到敦煌寫本《維摩詰經》相關文獻的著錄。

不過，初期研究者大多僅能仰仗北京圖書館及英、法公布零星寫卷的照片，少數學者有幸遠渡重洋，在倫敦、巴黎等圖書館也只能短暫的借閱，或透過展覽抄錄片段，撰寫序跋，或根據照片對個別寫卷挖寶式的研究。

1916年日本矢吹慶輝（1879-1936），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調查敦煌佛教文獻，並走訪法國巴黎。隔年舉辦了「敦煌古寫佛典照片展」，公布調查結果，並編成〈スタイン氏蒐集敦煌地方出土古寫佛典ロードグラフ解説目錄〉<sup>9</sup>。1922年12月到1923年7月再次赴英，大量拍攝敦煌佛典照片，特別著眼於正續《藏經》未收的古佚佛典。1930年將

<sup>6</sup> 妻木直良，〈敦煌石室五種佛典の解説〉，《東洋學報》1-3，1911年，頁350-365。

<sup>7</sup> 松本文三郎，〈敦煌本大雲經と賢愚經〉，《藝文》3-4、3-5，1912年，頁15-25、頁38-52。

<sup>8</sup> 李翊灼，〈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佛學叢報》8，1913年。

<sup>9</sup> 載《宗教研究》2-5、2-6、2-8，1917-1918年。

所獲重要寫本近二百種編成《鳴沙餘韻：燉煌出土未傳古逸佛典開寶》影印出版，1933年更出版《鳴沙餘韻解說》<sup>10</sup>，1932年2月刊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卷85古逸部便是根據《鳴沙餘韻》作為基本材料。其中自2768號《維摩義記》至2778號《淨名經關中釋抄》即輯錄英法及日本藏20件寫卷，12種《維摩詰經》注疏的錄文，提供了初期敦煌《維摩詰經》研究主要的文本依據。1937年，羅振玉則發表了〈姚秦寫本僧肇維摩詰經解殘卷校記〉<sup>11</sup>，這些都是個別零星的寫卷序跋與校記。

195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英藏敦煌漢文文書縮微膠卷的公布，學者們逐漸進入較為全面的綜合或深化的研究。1958年龍谷大學西域文化研究會將其所藏敦煌本〈維摩經疏〉加以披露翻刻錄文，同時還附有佐藤哲英調查文〈維摩經疏の殘缺本について〉<sup>12</sup>，文中參考《大正藏》第85卷「古佚部、疑似部」所收敦煌本〈維摩經〉相關資料進行解說。1968年，上山大峻〈八、九世紀敦煌における維摩經諸注釋の系譜〉<sup>13</sup>，更據《大正藏》2772號《維摩經疏》收錄P. 2049、P. 2040結合北京本帝86、為86、河99、生9、鳥87等類似進行譜系考述，發現北京本淡76與龍谷大學本具八、九世紀書寫特徵，推定與《大正藏》2772號收入的P. 2049、P. 2040為同時期之寫本。1978年橋本芳契〈敦煌資料に

<sup>10</sup> 矢吹慶輝編著，《鳴沙餘韻解說：燉煌出土未傳古逸佛典開寶》，東京：岩波書店，1933年。

<sup>11</sup> 羅振玉，〈姚秦寫本僧肇維摩詰經解殘卷校記〉，《七經堪叢刊》，上虞羅氏，1937年，頁40-128。

<sup>12</sup> 西域文化研究會編，〈維摩經疏卷第一〉，《西域文化研究》第1敦煌佛教資料，京都：法藏館，1958年，頁109-126。佐藤哲英，〈維摩經疏の殘缺本について〉，同前，頁127-132。

<sup>13</sup> 上山大峻，〈八、九世紀敦煌における維摩經諸注釋の系譜〉，《龍谷大學論集》387，1968年，頁106-131。

における維摩經——道掖淨名疏の俗信的特色》<sup>14</sup>一文則據《大正藏》第85卷2777《淨名經集解關中疏》、2778《淨名經關中釋抄》，並透過道掖關中疏與法照《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考察《維摩經》在淨土念佛等世俗信仰的特色。

1979至1990期間，日本可說是主導著敦煌本《維摩詰經》的研究發展。尤其大正大學平井宥慶及敦煌寫本研究會對敦煌本《注維摩詰經》、《維摩經疏》、《維摩經義記》展開了系列的整理、研究，發表了大量的成果。其中，平井宥慶1979年發表〈敦煌本・注維摩詰經序注釋書〉、〈敦煌本『維摩疏釋前小序抄』〉<sup>15</sup>；1982年有〈敦煌本・南北朝維摩經疏の系譜〉<sup>16</sup>將S. 2106、S. 2732、北京辰32等件敦煌本南北朝維摩經疏分為三系，〈敦煌本・南北朝維摩經疏と注維摩〉<sup>17</sup>據上文三系持與《注維摩詰經》及慧遠義記、智顗疏、吉藏疏透過科判進行比較；1983年有〈敦煌本『維摩經義記』〉<sup>18</sup>根據P. 2273、辰32、S. 2732等題有《維摩經義記》的寫本進行內容比較分析，〈敦煌本注維摩詰經の原形について〉<sup>19</sup>，根據S. 2106、S. 2732、辰32、P. 2273、

<sup>14</sup> 橋本芳契，〈敦煌資料における維摩經——道掖淨名疏の俗信的特色〉，《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7-1，1978年，頁88-95。

<sup>15</sup> 平井宥慶，〈敦煌本・注維摩詰經序注釋書〉，《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3，1979年，頁153-165；〈敦煌本『維摩疏釋前小序抄』〉，《豐山學報》24，1979年，頁67-84。

<sup>16</sup> 平井宥慶，〈敦煌本・南北朝維摩經疏の系譜〉，《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0-2，1982年，頁264-268。

<sup>17</sup> 平井宥慶，〈敦煌本・南北朝維摩經疏と注維摩〉，《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4，1982年，頁1-19。

<sup>18</sup> 平井宥慶，〈敦煌本『維摩經義記』〉，《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5，1983年，頁33-52。

<sup>19</sup> 平井宥慶，〈敦煌本注維摩詰經の原形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1-2，1983年，頁327-332。

S. 2733、S. 4102、P. 3308 等《維摩義記》及 S. 2660《聖鬘義記》從引用經論、注釋內容及注釋形式等面向，來考察敦煌本《注維摩詰經》的原本形態。緊接著平井更有〈敦煌本『維摩經義記』考〉、〈敦煌本・維摩經疏と勝鬘經疏〉、〈敦煌本・擬題『維摩經義記』〉、〈敦煌本北朝期維摩經疏にあらわれた思想〉等系列論文<sup>20</sup>。除了平井有慶系列論文外，這期間還有值得留意的研究篇章，如 1981 年臼田淳三的〈ペリオ 3006 番漢文佛典注釋書斷片をめぐって——鳩摩羅什譯以前の維摩經注釋書〉<sup>21</sup>，羅什本譯出前，其他諸本的注疏情況，傳世文獻記載極少，臼田氏注意到敦煌本 P. 3006 寫本為支謙譯《維摩詰經》注疏殘卷，此文對後來釋果樸碩士論文《敦煌寫本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sup>22</sup> 的研究當有所啟發。

此外，大正大學更組織敦煌寫本研究會，透過定期讀書會針對敦煌本《維摩義記》進行共同研究，將其研讀敦煌本 S. 2106《維摩義記》、S. 2732《維摩經義記》校錄全文先後於《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6~12 連續刊載<sup>23</sup>，奠定敦煌本《維摩詰經》注疏研究的良好基礎。

<sup>20</sup> 平井有慶，〈敦煌本『維摩經義記』考〉，《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2-1，1983 年，頁 115-121；〈敦煌本・維摩經疏と勝鬘經疏〉，《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3-1，1984 年，頁 72-77；〈敦煌本・擬題『維摩經義記』〉，《王生台舜博士頌壽記念：佛教の歴史と思想》，東京：大藏，1985 年，頁 607-622；〈敦煌本北朝期維摩經疏にあらわれた思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5-2，1987 年，頁 105-111。

<sup>21</sup> 臼田淳三，〈ペリオ 3006 番漢文佛典注釋書斷片をめぐって——鳩摩羅什譯以前の維摩經注釋書〉，《佛教史學研究》23-2，1981 年，頁 1-19。

<sup>22</sup> 釋果樸，《敦煌寫本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1996 年。

<sup>23</sup> 敦煌寫本研究會，〈敦煌本《維摩義記》〉(1)~(4)，《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6~9，1984-1987 年，頁 79-99、頁 123-136、頁 129-146、頁 77-100；〈敦煌本《維摩經義記》〉(1)~(3)，《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

1990 年以後，隨著各國寫卷紛紛以大型圖錄形式影印出版，敦煌文獻研究條件大為改善，研究視野更趨開闊，專題式的系統整理與研究得以漸次展開。1991 年，江素雲出版了《維摩詰所說經敦煌本綜合目錄》<sup>24</sup>，此目錄是在冉雲華教授指導下進行的。主要據王重民、劉銘恕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施萍婷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參考黃永武編《敦煌寶藏》及微卷等，著錄了英、法、北京藏敦煌卷子《維摩詰所說經》725 筆，列寧格勒藏《維摩詰所說經》77 筆，以及中日散藏《維摩詰所說經》24 筆，提供敦煌寫本《維摩詰所說經》文獻的初步訊息。1994 年中華佛研所禪叡更撰寫畢業論文《秦譯《維摩經·佛國品》斟訂探微》<sup>25</sup>，文中便對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注疏 153 件初步進行了全面的專題性整理。同年，方廣錫、許培鈴發表了〈敦煌遺書中的《維摩詰所說經》及其注疏〉<sup>26</sup>，文中根據北圖藏秋 70 號、新 386 號等五百號左右，英、法等國所藏約一百號，及若干散藏寫卷，對《維摩詰經》的內容、題記和注疏情形進行系統的考察。

2008 年，曾曉紅碩士論文《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sup>27</sup>，在方廣錫提供 250 多號敦煌《維摩經》注疏目錄的基礎上，參考相關圖版、錄文，計得《維摩經》注疏寫卷 311 號 38 種，分別加以敘錄，並附錄簡述有關研究論著 200 餘篇，企圖對敦煌遺書中《維摩經》注疏作出較為全面的梳理與介紹。作者自認為是相關研究搜集最全的一次，更希望

年報》10~12，1988-1990 年，頁 79-99、頁 96-108、頁 68-87。

<sup>24</sup> 江素雲，《維摩詰所說經敦煌本綜合目錄》，台北：東初出版社，1991 年。

<sup>25</sup> 禪叡，《秦譯《維摩經·佛國品》斟訂探微》，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4 年。

<sup>26</sup> 方廣錫、許培鈴，〈敦煌遺書中的《維摩詰所說經》及其注疏〉，《敦煌研究》4，1994 年，頁 145-151。

<sup>27</sup> 曾曉紅，《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能展示敦煌寫本《維摩經》注疏的多重價值，其整理當有助於《維摩經》注疏的研究。不過，由於受限於資料的公布，實際上曾氏未及敘錄的注疏還有不少，仍有待進一步發掘。

2012 年，鄒清泉發表〈中古敦煌《維摩詰經》的書寫——以藏經洞維摩寫卷為中心〉<sup>28</sup>，此文此係其博士論文《維摩詰變相研究》之一節，因其論文乃以「維摩詰經變相」為個案的研究，寫卷文獻僅為其研究背景之鋪墊。此文大抵在前賢既有的基礎上根據已公布之寫卷目錄，對中、英、法、俄等《維摩詰經》977 號，「維摩注疏」180 號，以及講經文、押座文、五更轉、贊文等 16 號，進行數量統計與量化介紹。其所統計，未能一一按覈寫卷，重複計算，在所不免。

除了對敦煌寫卷中《維摩詰經》相關文獻全面的敘錄與考察外，這段期間學者同時也出現對敦煌本《維摩詰經》個別寫卷深入考述與探究之論著。如釋果樸《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sup>29</sup>，通過論證認為敦煌寫卷 P. 3006 號可能是竺法護在長安譯出，聶承遠筆受，而且或許就是聶承遠加以刪修的《刪維摩詰經》；2001 年池麗梅發表〈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2005 年〈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單注本について〉<sup>30</sup>，針對羅振玉舊藏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斷片進行單注本與合注本的比較研究。2008 年，袁德領《敦煌研究院

<sup>28</sup> 鄒清泉，〈中古敦煌《維摩詰經》的書寫——以藏經洞維摩寫卷為中心〉，《敦煌學輯刊》1，2012 年，頁 57-67。（又見《虎頭金粟影——維摩詰變相研究》第 1 章第 3 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

<sup>29</sup> 釋果樸，《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台北：法鼓文化，1998 年。

<sup>30</sup> 池麗梅，〈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0-1，2001 年，頁 292 - 294；〈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單注本について〉，《仏教文化研究論集》9，2005 年，頁 62-85。

藏佚本〈維摩詰經注〉的幾個問題》<sup>31</sup>，對敦煌研究院藏敦研 0066、0067、0247 等 9 件古佚本《維摩詰經注》介紹其現狀、來源及定名，並進行綴合。孫致文〈上海博物館藏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上》寫本殘卷的研究意義〉<sup>32</sup>，此文係作者參與萬金川教授所主持研究計畫的部分成果，主要嘗試透過對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上》寫本殘卷的書法風格、字樣等外部特徵與譯詞、通假等內部特徵的析論，企圖驗證寫本真偽及其年代，並藉以獲知有關《維摩詰經》譯者與抄寫者的相關訊息。萬金川〈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諸法言品第五》上博寫卷校注〉<sup>33</sup>，此文與前文同為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主要針對上博寫卷俗字進行細緻校注。

2012 年，陶家駿博士論文《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研究》<sup>34</sup>，在袁德領的基礎上，針對敦煌研究院藏敦研 375 號等 9 件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進行細校，藉以探究寫來源、定名與綴合、體例與內容、寫本時代、注者考等。以為此寫卷乃北朝寫本，雖來源各異，然形式相同，蓋為同一人書寫。注者與羅什本人有著極為密切關係，為《維摩詰經》的早期注本，是研究羅什及其弟子思想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繼博士論文後，陶家駿、苗昱發表〈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再探——兼及「子母注」問題〉<sup>35</sup>，再論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

<sup>31</sup> 袁德領，〈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3，2008 年，頁 75-79。

<sup>32</sup> 孫致文，〈上海博物館藏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上》寫本殘卷的研究意義〉，《正觀雜誌》47，2008 年，頁 103-135。

<sup>33</sup> 萬金川，〈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諸法言品第五》上博寫卷校注〉，《正觀雜誌》47，2008 年，頁 137-186。

<sup>34</sup> 陶家駿，《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2 年。

<sup>35</sup> 陶家駿、苗昱，〈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再探——兼及「子母注」問題〉，《敦煌研究》3，2012 年，頁 91-96。

摩詰經注》以大字為標目，小字書寫注文，其體例為單注，而非「子母注」或集注。

整體而言，敦煌本《維摩詰經》的研究，更多的是偏向於殘片的考釋或者是單個注本中俗字的考釋，系統全面的研究，仍有待完整寫卷資料的整理。蓋以敦煌學乃一門以文獻為基礎的新興學科，非一般傳統文獻研究方法所能完全掌握。以目編目，僅能呈現一般文獻的概況。必須透過原卷一一的檢核，方能有全面而精確的掌握，然在資料未全面公布前，進行如此工作，實在不易。而且敦煌寫本作為新材料，也在不斷公布，雖有不乏有用心於資料系統的敘錄，如江素雲在《敦煌維摩詰所說經寫本綜合目錄》，苦心網羅了800多件，然如今公布所得已逾1400件，遠遠超過江素雲的統計。曾曉紅碩士論文《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雖專對敦煌文獻中《維摩詰經》注疏進行敘錄，並作詳細考證與梳理，資料上較具系統性，然亦有所缺漏與遺失，尤其上有諸多未見原卷，以致考證論述，難免有不夠嚴謹之處。

環顧目前敦煌寫卷公布狀況，英藏敦煌文獻從早期公布的 S. 0001 號到 S. 6980 號，後來《敦煌寶藏》翻印的 S. 7554 號，現在陸續公布已達 S. 13650 號；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早期公布 8679 號，微卷公布 8738 號，直至現今的 BD16579 號；俄藏也從早期目錄著錄的 2954 號，到現今 19092 號。其中保存的《維摩詰經》相關文獻，數量眾多。中國甘肅省藏、浙江省藏、天津藝術博物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等散藏敦煌文獻中也有《維摩詰經》相關文獻七、八十件。尤其 2013 年 3 月日本大阪財團法人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完成全部 9 冊彩色圖版的印刷刊布。其有關《維摩詰經》文獻的比率甚高，頗值得重視。

### 三、《敦煌秘笈》中所見《維摩詰經》相關文獻

《敦煌秘笈影片》冊1著錄了羽1到羽97，冊二著錄了羽98到羽164，冊三著錄了羽165到羽240，冊四著錄了羽241到羽332，冊五著錄了羽333到羽449，冊六著錄了羽450到羽527（其中486-500缺），冊七著錄了羽528到羽583，冊八著錄了羽584到羽665，冊九著錄了羽666到羽775（其中714、724號缺）。實際著錄與刊佈的有758號。

由於《敦煌秘笈》的主體為李盛鐸舊藏，李盛鐸乃敦煌寫卷流散史上最具有焦點的人物之一，其舊藏敦煌寫卷品質均佳，所以《敦煌秘笈》是日本私人收藏中數量最大宗、內容最受重視的藏品。其正式出版，無疑是敦煌學界的一大盛事。《敦煌秘笈》刊布的758號寫本文獻中收有《維摩詰經》相關文獻35件，頗值得留意。以下謹根據《敦煌秘笈》圖錄，並參考《敦煌秘笈》目錄，分類簡要敘錄，以供參考。

#### （一）經文

	卷號	經名	卷次	題記
1	羽 173	《維摩詰所說經》	三卷	卷末題記：「辛巳年三月廿日苾丘利濟在金光明寺點勘」
2	羽 268	《維摩詰經》	卷上	
3	羽 172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	
4	羽 309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	
5	羽 337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	
6	羽 359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	
7	羽 513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	題記：「丁未年正月廿三日汜賢子寫畢功記」
8	羽 515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	
9	羽 587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	
10	羽 645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	

11	羽 647	《維摩詰經》	卷第一	
12	羽 270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中	
13	羽 356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中	
14	羽 448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中	
15	羽 452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中	
16	羽 457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中	
17	羽 646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中	
18	羽 657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中	卷末題記：文明元年五月三日比丘禪 ／定解脫訖 後有長方形朱印陽文「合肥張氏闔家供養 經」
19	羽 733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中	
20	羽 150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下	
21	羽 269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下	
22	羽 277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下	
23	羽 310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下	
24	羽 386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下	

## (二) 注疏

	寫卷編號	經名	卷次	題記
1	羽 589	《僧肇單注維摩詰經》		
2	羽 325	《注維摩詰經》	卷第一	
3	羽 2	《維摩義記》	第二	卷末有「淨土寺藏經」墨色長印， 下有「李滂」（陰文朱印），後題 記作「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門 志寫記」，後有「李印盛鐸」（陰 文朱印）、「敦煌石室秘笈」（陽 文朱印）、「兩晉六朝三唐五代妙 墨之軒」（陽文朱印） 包首有：「維摩義記第二」「釋弟 子十析義」
4	羽 81	《維摩經疏》		首有「敦煌石室秘笈」陽文朱印、 「李滂」、「李盛鐸印」印。
5	羽 741V	《維摩經疏》		卷末有朱印一顆「德化李氏凡將閣 珍藏」陽文朱印

6	羽 81V	《維摩經疏開題并科文一覽》	卷首有朱印一顆「敦煌石室秘笈」陽文朱印 開題首題有「李盛鐸印」、「李滂」
---	-------	---------------	---

### (三) 淨名經集解關中疏

	卷號	經名	題記
1	羽 422	《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	卷末有朱筆題記：「大唐咸通八年歲次丁亥三月七日說畢」 墨書「比是明照本」
2	羽 748	《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序》	卷末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陽文朱印
3	羽 94	《淨名經關中疏釋抄》	

### (四) 經抄

	卷號	經名	題記
1	羽 24V	《維摩詰所說經抄》	
2	羽 623	《釋肇序抄義》	朱筆題記：「午年五月廿五日沙門全證寫勘記」 題記後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陽文朱印

### (五) 讚

卷號	經名	題記
羽 155	《維摩讚》	

## 四、《敦煌秘笈》中《維摩詰經》文獻之價值與問題

### (一) 《敦煌秘笈》有關《維摩詰經》文獻之價值

王重民在廣泛閱讀敘錄敦煌寫卷的經驗下，曾概括敦煌佛經寫本的3點價值：「一是寫本之古，足以校勘宋代以後開雕的各藏；二是古佚經、

佚文之多，可以補足宋代以後各藏的不足；三是有一些佛教史料過去失傳，佛教史上一些未解決的問題，只有利用了敦煌佛教史料以後，才獲得了解決。」<sup>36</sup> 敦煌寫本中有關《維摩詰經》大量文獻所呈現的價值印證了此一看法。若進一步細緻的觀察，還可考察經注義疏體式的演變，探究維摩信仰的發展。

《敦煌秘笈》中有關《維摩詰經》36件文獻，有《維摩詰經》經文24件，《維摩詰經》注疏義記6件，《淨名經關中疏》3件，《維摩詰經》經抄1件、《釋肇序抄義》1件、《維摩讚》1件。其中經文佔最多，且均屬鳩摩羅什譯的三卷本。雖是傳世文本，文獻價值不高，然仍具文字校勘之價值。此外，從其傳抄情形可印證羅什本盛行之實況。同時從個別寫本抄寫的情形也可考察《維摩詰經》之流布與敦煌文獻流散史。

### 1.《維摩詰經》經文

《敦煌秘笈》中有關《維摩詰經》36件文獻中，24件為《維摩詰經》經文。其中一件（羽173）為上中下三卷，存卷上的有10件，卷中的有8件，卷下的有5件，均屬鳩摩羅什譯的三卷本。大多為7至9世紀唐、五代時期抄本。其中有三件有題記，署有年代。分別是：

羽657《維摩詰所說經》卷中之卷末題記：「文明元年五月三日比丘禪定解脫訖」，後鈐有「合肥張氏闔家供養經」長方形朱印陽文。按：「文明」是唐睿宗李旦在位時使用的第一個年號，時間為684年2月27日~684年10月18日，時間共計8個月不到。是羽657《維摩詰所說經》

<sup>36</sup> 王重民遺稿，〈記敦煌寫本的佛經〉，《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2，1983年，頁1-25（後收入《敦煌遺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88-308）。

乃唐睿宗時之抄本。從「合肥張氏闔家供養經」印可知此件係張廣建舊藏。張廣建（1864-1938），字勛伯，又作勛帛，安徽合肥人。1914年任甘肅巡按使，督理甘肅軍務時，攫取的敦煌寫經，後經白堅轉手，出售給日本人，尤以北三井所藏為多<sup>37</sup>。此或可供作考察張廣建舊藏流散之參考。

羽 173《維摩詰所說經》（3卷），卷末有題記「辛巳年三月廿日苾丘利濟在金光明寺點勘。」按：「利濟」一名亦見《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津藝 030《淨名經關中疏卷下》<sup>38</sup>殘卷，尾題《淨名經關中疏卷下》，後亦有題記云：「蕃中二年三月十七日于沙洲金光明寺寫訖比丘利濟」<sup>39</sup>。考「利濟」為吐蕃統治時期沙洲敦煌著名的僧人：「金光明寺」是唐宋時期敦煌僧寺之一，位於沙洲城西。據 S. 2729「牌子曆」，吐蕃統治敦煌時期辰年（788）初見其名。利濟俗姓姚，人稱姚和尚<sup>40</sup>，生卒年不詳。出家後在金光明寺修行。S. 2729「牌子曆」中，金光明寺下有「姚利濟」，可知姚和尚即利濟，為敦煌金光明寺僧人。今敦煌文獻中保存有不少利濟所抄寫的佛教典籍，如：B. 6986（辰46）《四分律刪補羯磨》，卷末題記云：「午年五月八日，金光明寺僧利濟初夏之內，為本寺上座金曜寫此《羯磨》一卷，莫不精研盡思，庶流教而用之，至六月三日畢而後記焉。」S. 1520《法門名義集卷》，

<sup>37</sup> 參清水實、樋口一貴，〈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經の傳來と調査の経緯〉，《三井文庫別館藏品圖錄：敦煌寫經—北三井家一》，東京：財團法人三井文庫，2004年，頁53-67。

<sup>38</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冊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76。

<sup>39</sup> 按：津藝 030 頗有可疑，題記「蕃中二年三月十七日于沙洲金光明寺寫訖比丘利濟」「蕃中二年」稱法不合習慣，當是「蕃中未年」，後添加題記者不知吐蕃紀年致誤作「蕃中二年」。且題記字跡與文本亦不甚合。

<sup>40</sup> P. 3664《姚和上金剛五禮》，此姚和上當即指利濟。

卷末題記有云：「蕃中末年三月十一日比丘利濟於沙州金光明〔寺〕三本勘訖記耳。」<sup>41</sup>此外，還撰寫有不少佛教贊文，如：P. 3052 有詩一首，題為「僧利濟」所作：「良牧思弘化，吾師重契經。欲聞三草喻，先列四花名。瑞色浮春日，和風引梵聲。坐承方便理，咸得悟無生。」S. 6631V 有〈唐三藏讚〉1 首，亦題「釋利濟」所作：「嵩山秀氣，河水英靈。捷特瑰傳，脫履塵榮。鄉園東望，竺國西傾。心存寶偈，志切金經。戒賢忍死，邪賊畢形。彌勒期契，觀音願成。辯論無當，慈悲有情。一生激節，萬代流名。」S. 1520 題記「蕃中末年（791）」，可見姚和尚應是敦煌陷蕃時期的僧人。吐蕃占領敦煌時期為唐德宗建中 2 年（781）到唐宣宗大中 2 年（848）。據此推測，姚和尚製作《金剛五禮》的時代，當在第 8 世紀中葉以後了。羽 173《維摩詰所說經》題記「辛巳年」當在 801 年。

羽 513《維摩詰所說經》卷上，卷末有題記：「丁未年正月廿三日汜賢子寫畢功記」。按：吐蕃時期敦煌僧俗抄寫《大般若經》的風氣盛行，根據現存敦煌文獻記載，在吐蕃統治末期到歸義軍初期，敦煌地區進行一次規模很大的抄經活動，S. 1890《大般若經卷二百六十一》卷末也出現了抄手「汜賢子」姓名。「丁未年」可能有三，即：827 年、887 年、947 年。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定年次為詳，九世紀前期<sup>42</sup>。據此則「丁未年」當是唐文宗太和元年，西元 827 年為吐蕃佔領敦煌時期。

<sup>41</sup> 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釋錄》冊 7，著錄為：「蕃中末年三月十一日比丘妙濟於沙州金光明〔寺〕三本勘訖記耳。」「妙濟」當為「利濟」（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11）。

<sup>42</sup>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頁 365。

## 2.《維摩詰經》注疏

除了 24 件佔多數的經本外，屬於注疏的 6 件，《淨名經關中疏》3 件，《釋肇序抄義》1 件，亦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茲舉例簡略說明如下：

羽 325《注維摩詰經》卷第 1 殘卷，內容為會合鳩摩羅什及其弟子僧肇、竺道生的注本。其字體具北朝隸書風格，抄本時代早，距《注維摩詰經》成書時代近，極具價值。按：僧肇等人的《注維摩詰經》，自來稱謂及卷數不一。傳世的本子為 10 卷本<sup>43</sup>。今所得見的敦煌文獻中，有關《注維摩詰經》寫卷，約 20 號，就內容系統論，可區分為 10 卷本與 8 卷本。其形式均採逐句注釋方式，經文單行，注文於經文下以雙行小字出之。10 卷本引鳩摩羅什注蓋以「什曰」開頭，僧肇注，以「僧曰」開頭，「竺道生注」以「生曰」開頭。羽 325《注維摩詰經》殘卷，同以「什曰」、「肇曰」開頭，而引「竺道生注」則作「道生曰」。顯然與今傳世的 10 卷本有所不同，文字亦小有出入，可供校勘。又羽 325 所引鳩摩羅什注「胡本云」，今傳 10 卷本引作「梵本云」，當是後改，則羽 325《注維摩詰經》殘卷當是原始且較完整彙集羅什等人單注本的 8 卷本<sup>44</sup>。

羽 589《芳草落花》上，第 1、2 片雖僅殘存 2 片 12 行，但其形式採逐句注釋方式，經文大字單行，注文於經文下以雙行小字出之。殘存的注文內容均為僧肇注，且注文開頭並無「肇曰」的稱引。可確定為僧肇單注《注維摩詰經》，字跡具隸書風格，抄寫時代蓋為北朝，與僧肇單注流行時間相近，雖為殘片，意義非凡。甘肅博物館藏 129《注維摩

<sup>43</sup> 《注維摩詰經》，CBETA, T38, no. 1775。

<sup>44</sup> 釋果樸《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以為：「以藏經的校對八卷本，比對敦煌寫本《關中疏》推得八卷之甲本較今十卷本為古。」（台北：法鼓文化，1998 年，頁 55。）

詰經·弟子品三》殘卷，也是採逐句注釋方式，經文大字單行，注文於經文下以雙行小字出之。共 191 行，行約 17 字。內容僅有僧肇注內容，未見羅什及竺道生，且注文開頭並無「肇曰」，亦是僧肇單注。楷體，依書風，抄寫時代當是北朝至隋唐。

注疏義記方面，羽 2《維摩義記》第 2，值得討論。此卷 1937 年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維摩經義記》」下著錄：「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門靜志寫記。影印本」<sup>45</sup>。實際根據 1935 年中央時事週報刊載的《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其所指乃李盛鐸舊藏（《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作散 0191），過去因未能獲見原卷，僅以目轉引。原卷今歸杏雨書屋，為《敦煌秘笈》羽 2。殘卷內容核以《大正藏》，乃隋·淨影寺慧遠（542-592）《維摩義記》卷第 2 殘卷。卷末有「淨土寺藏經」墨色長印，下有「李滂」（陰文朱印），後題記作「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門靜志寫記」，後有「李印盛鐸」（陰文朱印）、「敦煌石室秘笈」（陽文朱印）、「兩晉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軒」（陽文朱印）。根據收藏印記當是李盛鐸舊藏無疑，後其子李滂透過白堅轉手羽田亨<sup>46</sup>。

此卷尤其受到重視的是「甘露二年」的題記。有甘露 2 年記年的古寫經有二件，另一件是東京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譬喻經》（出廣演品、出地獄品）殘卷，據傳出自敦煌石室。卷末題記為：「甘露元年（359）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齋叢中寫訖。此月上旬漢人及雜類被誅向二百人。願蒙解脫，生生敬信三寶，無有退轉。」另一件即羽 2 李盛鐸舊藏的《維摩義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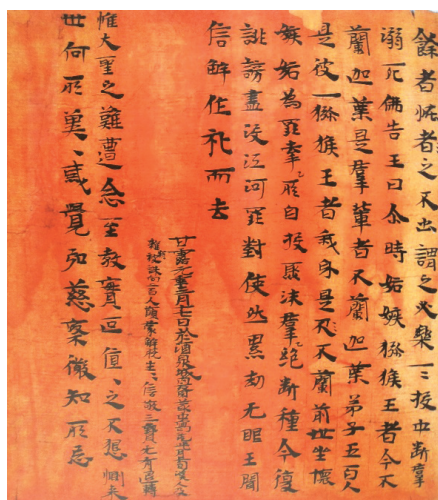
<sup>45</sup> 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上海：佛學書局，1937 年。

<sup>46</sup> 參高田時雄，〈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2007 年，頁 1-26；〈李滂と白堅（補遺）〉，《敦煌寫本研究年報》2，2008 年，頁 185-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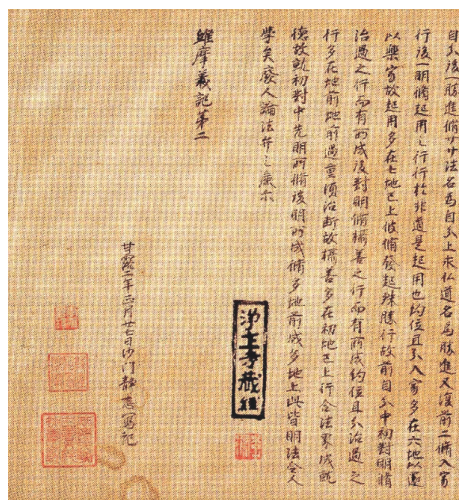
歷史上使用「甘露」年號的，有：漢宣帝劉詢，一共 4 年，自西元前 53 年至前 50 年；三國曹魏高貴鄉公曹髦的第 2 個年號，共計 5 年（256-260 年）；三國時期東吳的君主吳末帝孫皓的第 2 個年號，共計 2 年（265-266 年）；十六國前秦苻堅的第 2 個年號，共計 6 年（359-364 年）；高昌君主麴光的 1 個年號，共計 6 年（約 525-約 530 年）；東丹國人皇王耶律倍的年號，共計 11 年（926-936 年）。

學界一般以為是前秦苻堅甘露 2 年<sup>47</sup>。個人以為中村不折舊藏《譬喻經》（出廣演品、出地獄品）殘卷字跡具隸書風格，合乎北朝時代書風。羽 2 李盛鐸舊藏的《維摩義記》不具隸書風格，楷字亦不佳，不似北朝書風。或以為羽 2《維摩義記》題記的甘露 2 年，是高昌麴光的甘露 2 年，西元 526 年。但無論是前秦苻堅甘露 2 年（360）或高昌麴光的甘露 2 年（526），均早於隋·慧遠（542-592）撰著《維摩義記》的時代。東丹國人皇王耶律倍年號的時代雖然合於敦煌寫本的下限，然敦煌或西域地區不可能使用東丹國年號，東丹國的寫本也不可能流入敦煌或西域地區。余詳審羽 2《維摩義記》寫卷，其正文與題記墨色字跡似有不同。極有可能題記為後人所添加，藉以提高寫卷的售價。有待進一步追考。

<sup>47</sup> 吳震，〈敦煌吐魯番寫經題記中「甘露」年號考辨〉，《西域研究》1，1995 年，頁 17-27（後收入《吳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41-152）。釋果樸，《敦煌寫本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台北：法鼓文化，1998 年，頁 58-89。



■ 中村不折舊藏《譬喻經》



■ 《敦煌秘笈》羽2

日本杏雨書屋《敦煌秘笈》羽2《維摩義記·卷二》（原李盛鐸舊藏）。自來學者以此卷有尾題「維摩經義記 甘露二年（360年）正月廿七日沙門靜志寫記」。由於此卷在《敦煌秘笈》未公布前，學者多根據《李木齋氏鑒藏燉煌寫本目錄》所提供的資訊來推論。「甘露」年號見於漢、曹魏、孫吳、苻秦、遼等多個朝代，學界多將此卷定為苻秦，苻秦甘露2年是西元360年，因以為是現存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的敦煌本《維摩經》注疏寫卷。甚至以為此卷紀年早於406年羅什重譯的《維摩詰所說經》，釋果樸因推測該卷是支謙本的義記。曾曉紅《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據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著錄此卷云「維摩經義記卷二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門靜志寫記。」而以為：李盛鐸舊藏《維摩經義記》是現存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的敦煌本《維摩經》注疏寫卷。該卷撰者及原著卷數均不詳，原為清朝末年的收藏家李盛鐸所有，尾題「甘露」年號見於漢、曹魏、孫吳、苻秦、遼等多個朝代，學界多將此卷定為苻秦。因此以為此卷紀年早於406年羅什重譯的《維摩詰所說

經》，認為是支謙本的義記，為歷代大藏經所未收。之所以有如此的推測，蓋以未見原卷，全憑目錄，難以核實。

按：此卷 1937 年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維摩經義記》」下著錄：「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門靜志寫記。影印本」。實際根據 1935 年中央時事周報刊載的《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其所指乃李盛鐸舊藏（《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作散 0191），過去因未能獲見原卷，僅以目轉引。原卷今歸杏雨書屋，為《敦煌秘笈》羽 2。殘卷內容核以《大正藏》，乃隋·淨影寺慧遠《維摩義記》卷第 2 殘卷。

過去學界未核實原文前，大多據此題記以為是前秦苻堅甘露 2 年。然而從字體論：羽 2 寫卷抄寫文字為楷體，不具隸意，顯非北朝隸楷、或晉楷風格。我們持與中村不折舊藏有甘露元年題記的《譬喻經》殘卷比較，不難看出其橫畫起筆、捺筆均明顯不同，《譬喻經》殘卷字跡具隸書風格，合乎北朝時代書風的寫卷。羽 2 李盛鐸舊藏的《維摩義記》不具隸書風格，楷字亦不佳，不似北朝書風。

又從寫卷俗字來考察，羽 2 寫卷多合唐五代書寫習慣，如偏旁單人、雙人不分：待作侍、彼作佗等。尤其是羽 2《維摩義記》的內容經詳為比對，確為隋·淨影寺慧遠《維摩義記》。各種「甘露二年」的年代推測，均早於隋·慧遠（542-592），合理的情況是此卷題記蓋為後加，原卷乃唐寫本。

### 3.《淨名經關中疏》

《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淨名經關中釋抄》，為唐代僧人道液吸收諸家對《維摩詰經》的注釋並加以批注而成，是研究唐代佛教思想的主要資料。然此二書早已失傳，歷代舊藏皆未收錄，敦煌寫本發現後，

據英、法所藏部分敦煌寫卷輯錄載《大正藏》第 85 冊《古佚部·疑似部》。之後敦煌本披露漸多，甚受關注。京戶慈光〈關於《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群〉<sup>48</sup> 分析了《淨名經關中疏》的分類依據及方法，進而介紹了敦煌佛教文獻分類方法，便於我們對敦煌佛經的理解掌握。《敦煌秘笈》羽 422《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卷末有朱筆題記：「大唐咸通八年歲次丁亥三月七日說畢」墨書「比是明照本」；羽 748《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序》，卷末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陽文朱印。而羽 94《淨名經關中疏釋抄》與北大 D245《注維摩經序疏釋》內容相關聯，值得進一步探究。

## （二）《敦煌秘笈》中《維摩詰經》相關文獻之真偽問題

《敦煌秘笈》是羽田亨從 1935 年起積極收集的敦煌寫本，主要是來自李盛鐸的舊藏。現今杏雨書屋所藏，除了以李盛鐸舊藏為主體外，還有後來陸續購自高楠順次郎、富岡謙藏、清野謙次以及其他私家舊藏。其原為中國名家收藏，幾經週折，輾轉易手，而歸結匯集於杏雨書屋，其珍貴實有不可忽視者。然亦疑有贗品，不可不謹慎。

將羽田亨《敦煌秘笈目錄》依件數、順序、注記等持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比較，可以肯定榮新江推論「此目錄出自李盛鐸之子李滂（少微）之手，故當為李氏家藏敦煌寫本的全目錄」的說法，進而確認李盛鐸舊藏寫本歸於羽田亨之手。經比對後，可確定《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著錄的 432 件，即杏雨書屋《敦煌秘笈》羽字 1 號到 432 號<sup>49</sup> 無疑。這批李盛鐸的舊藏，品質均佳，

<sup>48</sup> 京戶慈光，〈關於《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群〉，《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 375-384。

<sup>49</sup> 參見鄭阿財，〈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來源、價值與研究現況〉，《敦煌研究》3，2013 年，頁 116-127；高田時雄，〈羽田亨與敦煌寫本〉，《敦煌研

不但為學界確認之真品，而且還是珍品。

《敦煌秘笈》刊布的758件，除前432件確實來自李盛鐸舊藏外，高田時雄還根據羽田亨目錄，將《敦煌秘笈》其他來源進行統計，其中433、434、435、436、448、449、450、456、457、461、462、463、464從佐佐木處購入；437-446從北尾處購入；447於奉天購入；451-455羽溪了諦讓與；459購自高楠順次郎；460、501-550購自富岡謙藏；465-467谷口氏讓與；468-473西脇濟三郎讓與；474-480中村敏雄讓與……。其中591-736等146件係1939年後購自古董商江藤濤雄。江藤氏在東京開設「長安莊」，經營古董生意。大正至昭和年間，自中國引進大量文物、書畫，出售給日本各地收藏家、大學、博物館。今日本所藏敦煌吐魯番及西域文獻頗多由他經手。其中頗有贗品，尤其是鈐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多半出自於天津造。大抵為出自李盛鐸外甥陳益安（或作陳逸安）之手偽造的唐人寫經，用由敦煌盜出之唐人寫經紙和舊墨及其書仿造，以假亂真，技術高明，北京、天津、上海一帶受其騙者不少。<sup>50</sup>1986年藤枝晃曾撰文對京都國立博物館所藏鈐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的敦煌寫本表示懷疑<sup>51</sup>。《敦煌秘笈》中購自江藤濤雄長安莊且鈐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的敦煌寫本，如：羽623《釋肇序抄義》殘卷，後有朱筆題記：「午年五月廿五日沙門全證寫勘記」，題記後鈐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陽文朱印，羽741V《維摩

究》3，2014年，頁184-189。

<sup>50</sup> 參榮新江，〈李盛鐸寫卷的真與偽〉，《敦煌學輯刊》2，1997年，頁1-18（收入《鳴沙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頁103-146；《敦煌學十八講》第18講〈敦煌寫本的真偽辨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52-364）。又參雷夢辰，《天津三大商場書肆記》，《天津文史資料選輯》52，1990年，頁67。

<sup>51</sup> 藤枝晃，〈「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について〉，《京都國立博物館學叢》7，1986年，頁153-173。

經疏》、羽748《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序》鈐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陽文朱印，這幾件寫卷很有問題。

按：《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津藝 061B（77.5.440202）《汴州司馬朱狀》<sup>52</sup>，邊鈐白文方印「周暹」，朱文方印「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周叔弢舊藏。1987 年鑒定為偽作；又津藝 061H（77.5.440208）《文稿》<sup>53</sup>，首鈐朱文方印「木齋珍藏」，白文方印「周暹」，尾鈐朱文方印「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周叔弢舊藏。1987 年鑒定為偽作。其情況與杏雨書屋所藏購自江藤濤雄長安莊的卷子相同，顯然都是屬於天津造。因此，在利用此批《維摩詰經》相關文獻時，宜格外謹慎，方可避免陷入誤區。

## 五、結語

敦煌石室保存為數可觀的《維摩詰經》相關文獻，有經本、有注疏、有義記。其中有許多歷代大藏經所未收，後世失傳，甚至是歷代經不錄，而早已亡佚中古時期的注疏，極其珍貴。自發現以來，深受學者的重視。1937 年，羅振玉在《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刊錄了 2 件《維摩詰經解》，隔年更撰寫了〈姚秦寫本僧肇維摩詰經殘卷校記〉，對敦煌寫本僧肇《維摩詰經解》進行校釋。在此前後中國學者李翊灼、陳垣等對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劫餘的《維摩詰經》相關文獻的編目、定名也做出了努力。有關的整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先是高楠順次郎等編修《大正新修大藏經》時，特別在古佚部疑似部中，收錄了《維摩義記》、《維摩經疏》、《釋肇序》、《淨名經關中釋抄》……等 11 種

<sup>52</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冊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306。

<sup>53</sup> 同上，頁 310。

敦煌寫本，成果最為卓著。之後，日本學者平井宥慶、上山大俊、佐藤哲英、臼田淳三……等，更進一步對《維摩詰經》各注疏展開專題研究，成績斐然。回顧敦煌《維摩詰經》的研究歷程，或撰寫題跋，或校錄文本，或進行考釋，或分類探源，主要建立在文獻的公布與編目、定名的基礎上。從杏雨書屋《敦煌秘笈》所見的《維摩詰經》相關文獻，以及其中與英、法、中、俄等已公布相關文獻的密切關係，可見必須彙整已公布的所有寫卷，結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方能有良好的論述與佐證。

如：羽 589 僧肇單注《注維摩詰經》與甘肅博物館藏 129《注維摩詰經·弟子品三》殘卷、羅振玉《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2 件《維摩詰經解》的結合，有助於單注本的研究，同時持與 8 卷本、10 卷本《注維摩詰經》比較，對梳理《注維摩詰經》寫卷的系統以及考察其發展，必多裨益。

此外，未經正式公布，尚知見有：山東博物館有 4 件；天津藝術博物館 15 件、四川博物院 1 件、青島市博物館 1 件……等。所以編纂《維摩詰經》相關文獻的聯合專題目錄，實有其需要，各收藏單位分頭進行敘錄，乃階段性的務實工作，本文的撰寫即為未來《敦煌寫本維摩詰經相關文獻及研究目錄》的編纂預作準備。相信以微觀的寫卷敘錄為基礎，進而系統的分類，當有助於注、疏、義記個案專題的校錄與研究，以及宏觀視野對《維摩詰經》注疏發展史的考察。

## 引用書目

- 《注維摩詰經》，CBETA, T38, no. 1775。
- 《大唐內典錄》，CBETA, T55, no. 2149。
-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 《高僧傳》，CBETA, T50, no. 2059。
- 《眾經目錄》，CBETA, T55, no. 2146、2147、2148。
- 《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 上山大峻，1968，〈八、九世紀敦煌における維摩經諸注釋の系譜〉，《龍谷大學論集》387，頁 106-131。
- 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編，1996，《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冊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1983，《佛教經典總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方廣錫、許培鈴，1994，〈敦煌遺書中的《維摩詰所說經》及其注疏〉，《敦煌研究》4，頁 145-151。
- 王重民，1983，〈記敦煌寫本的佛經〉，《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2，頁 1-25。
- 平井有慶，1979，〈敦煌本・注維摩詰經序注釋書〉，《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3，頁 153-165。
- 平井有慶，1979，〈敦煌本『維摩疏釋前小序抄』〉，《豐山學報》24，頁 67-84。
- 平井有慶，1982，〈敦煌本・南北朝期維摩經疏と注維摩〉，《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4，頁 1-19。
- 平井有慶，1982，〈敦煌本・南北朝期維摩經疏の系譜〉，《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0-2，頁 264-268。
- 平井有慶，1983，〈敦煌本『維摩經義記』〉，《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5，頁 33-52。
- 平井有慶，1983，〈敦煌本『維摩經義記』考〉，《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2-1，頁 115-121。
- 平井有慶，1983，〈敦煌本注維摩詰經の原形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

- 究》31-2，頁 327-332。
- 平井宥慶，1984，〈敦煌本・維摩經疏と勝鬘經疏〉，《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3-1，頁 72-77。
- 平井宥慶，1985，〈敦煌本・擬題『維摩經義記』〉，《王生台舜博士頌壽記念：佛教の歴史と思想》，東京：大藏，頁 607-622。
- 平井宥慶，1987，〈敦煌本北朝期維摩經疏にあらわれた思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5-2，頁 105-111。
- 矢吹慶輝，1917-1918，〈スタイン氏蒐集敦煌地方出土古寫佛典ロードグラフ解説目録〉，《宗教研究》2-5、2-6、2-8。
- 矢吹慶輝，1933，《鳴沙餘韻解説：燉煌出土未傳古逸佛典開寶》，東京：岩波書店。
- 臼田淳三，1981，〈ペリオ 3006 番漢文佛典注釋書斷片をめぐって——鳩摩羅什譯以前の維摩經注釋書〉，《佛教史學研究》23-2，頁 1-19。
- 池田溫，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江素雲，1991，《維摩詰所說經敦煌本綜合目録》，台北：東初出版社。
- 西域文化研究會編，1958，〈維摩經疏卷第一〉，《西域文化研究》第 1 敦煌佛教資料，京都：法藏館，頁 109-126。
- 池麗梅，2001，〈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0-1，頁 292-294。
- 池麗梅，2005，〈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單注本について〉，《仏教文化研究論集》9，頁 62-85。
- 佐藤哲英，1958，〈維摩經疏の殘缺本について〉，《西域文化研究》第 1 敦煌佛教資料，京都：法藏館，頁 127-132。
- 吳震，1995，〈敦煌吐魯番寫經題記中「甘露」年號考辨〉，《西域研究》1，頁 17-27。
- 李翊灼，〈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録〉，《佛學叢報》8，1913 年。
- 京戶慈光，2003，〈關於《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群〉，《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頁 375-384。
- 妻木直良，1911，〈敦煌石室五種佛典の解説〉，《東洋學報》1-3，頁 350-365。

- 松本文三郎，1912，〈敦煌本大雲經と賢愚經〉，《藝文》3-4、3-5，頁15-25、頁38-52。
- 孫致文，2008，〈上海博物館藏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上》寫本殘卷的研究意義〉，《正觀雜誌》47，頁103-135。
- 袁德領，2008，〈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3，頁75-79。
- 郝春文主編，2010，《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釋錄》冊7，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
- 高田時雄，2007，〈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頁1-26。
- 高田時雄，2008，〈李滂と白堅（補遺）〉，《敦煌寫本研究年報》2，頁185-190。
- 高田時雄，2014，〈羽田亨與敦煌寫本〉，《敦煌研究》3，頁184-189。
- 清水實、樋口一貴，2004，〈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經の傳來と調査の経緯〉，《三井文庫別館藏品圖録：敦煌寫經—北三井家—》，東京：財團法人三井文庫，頁53-67。
- 許國霖，1937，《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上海：佛學書局。
- 陶家駿，2012，《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論文。
- 陶家駿、苗昱，2012，〈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再探——兼及「子母注」問題〉，《敦煌研究》3，頁91-96。
- 敦煌寫本研究會，1984-1987，〈敦煌本『維摩義記』〉(1)~(4)，《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6-9，頁79-99、頁123-136、頁129-146、頁77-100。
- 敦煌寫本研究會，1988-1990，〈敦煌本『維摩經義記』〉(1)~(3)，《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10~12，頁79-99、頁96-108、頁68-87。
- 曾曉紅，2008，《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湯用彤，1938，《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長沙：商務印書館。
- 萬金川，2008，〈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諸法言品第五》上博寫卷校注〉，《正觀雜誌》47，頁137-186。

- 鄒清泉，2012，〈中古敦煌《維摩詰經》的書寫——以藏經洞維摩寫卷為中心〉，《敦煌學輯刊》1，頁 57-67。
- 雷夢辰，1990，《天津三大商場書肆記》，《天津文史資料選輯》52，頁 67。
- 榮新江，1997，〈李盛鐸寫卷的真與偽〉，《敦煌學輯刊》2，頁 1-18。
- 鄭阿財，2013，〈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來源、價值與研究現況〉，《敦煌研究》3，頁 116-127。
- 橋本芳契，1978，〈敦煌資料における維摩經——道掖淨名疏の俗信的特色〉，《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7-1，頁 88-95。
- 禪叡，1994，《秦譯《維摩經·佛國品》斟訂探微》，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 羅振玉，1937，〈姚秦寫本僧肇維摩詰經解殘卷校記〉，《七經堪叢刊》，頁 40-128。
- 藤枝晃，1986，〈「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について〉，《京都國立博物館學叢》7，頁 153-173。
- 釋果樸，1996，《敦煌寫本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
- 釋果樸，1998，《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台北：法鼓文化。

